

俄国历史概要

下 册

〔苏〕波克罗夫斯基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俄 国 历 史 概 要

(下 册)

〔苏〕波克罗夫斯基著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俄国历史概要

上、下册

〔苏〕波克罗夫斯基著

贝璋衡、叶林、葆煦译，贝璋衡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0.75印张 609,000字

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1002·487 定价(上下册)2.90元

(内部发行)

第 三 编

二 十 世 纪

第一分册 1896—1906年

第四版序言

生活在迅速地前进,因而作者在1927年本来认为多少总能站得住的《概要》第三编第三版的文字,现在已经不能使作者本人完全满意了。要想了解作者对我国第一次革命的新观点,不妨参阅作者所写关于1905年的一本小册子^①。这本小册子将比本书的第四版先出。但是,要依据这本小册子里(其中所提供的事实只是作为例证之用的)所发挥的观点把本书加以改写,这不是一个月所能办到的事。市面上已经没有这书了,而纪念1905年革命则是明天的问题。关于我国历史上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总得有一部教科书,所以只好满足于第三编的实际材料既没有重大的疏漏,也没有显然的错误。凡是能改的都改正了。但遗憾的是这不是一部新写的书,而论述1905年的新书我们是很需要的。但是我们更需要一部论述1917年的书。必须致力于最需要的方面。

1930年8月15日

米·波·

① 本书末后(见附录二)附有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在莫斯科红色勃列斯尼亚区积极分子大会上的发言(1930年12月11日)。作者在发言中根据在上述小册子里所发挥的观点,对《概要》第三编中叙述1905年革命史时所持的某些见解做了批判。——俄文版编者注

第三版序言

在本书出第二版时就很想做的事，在第三版里实现了，这就是根据第一版问世以来，于1921—1923年间出现在报刊上的关于1905年革命的新资料，把本书加以改写。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那时所发表的材料与现在所知道的相比，是一与十之差。第一版许多篇幅所根据的，有的是多少有点偶然地落到作者手里的档案文件，有的甚至是作者作为1905年革命参加者之一的个人回忆。但是教科书与回忆录是不同的两种东西。必须尽可能抛掉书里面的“回忆”部分，根据有系统地出版的文件，而不是根据作者偶然看到的文件来叙述所有的一切，不然的话，人们就有权指责书的内容陈旧了。

要把所有各章一律改写，由于新发表的材料过多，时间毕竟不够。第九章《1905年边疆地区的革命》尤其如此。例如，菲·马哈拉泽同志的一部写得很出色的书《外高加索革命运动论文集》在新版里就没有被利用。但是由于这部书有俄文译本，而且写得很通俗，所以使得我的《概要》对于那些对外高加索革命特别感兴趣的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多余的了。因此，本书有关这方面的

篇幅只是为了提供一般的线索,并且据作者来看,这些篇幅对于达到这个目的还是有用的,因为其中没有严重的错误。但是作者不愿隐瞒这一事实,就是这一章原封未动的主要原因是时间不够。

根据另外一些理由,第二章(《工业危机和群众性工人运动》),第四章(《日本的战争》)和第八章(《资产阶级关于立宪的徒劳》)几乎都没有改动。第四章在第二版中已经改写了。这一章是在1925年秋季最后定稿的,而在过去两年中任何人也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什么真正新的材料。关于第八章也几乎要这样讲。至于有关第二章的新材料,则它们并不能改变《概要》尽一切可能提供的一般情况。

然而第一章(《革命时期的经济》)、第三章(《农村群众性运动的开始》)、第六章(从前的标题是《工人革命》,现在是《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和第七章(《农民起义》),则根据最新文献完全改写了。最后,第五章(《1月9日和“波将金”号》,旧标题是《1月9日。沈阳和对马》),有了很大的改动,重新改写了它的结尾部分,对前半章也做了许多补充。

此外,这一版重新改写了第十章(《斯托雷平政策时期》)。有了这一章,1905年的革命史才具有十分完整的面貌。《概要》第三编的新分册将从革命史新的一章开始,即从1912—1914年工人运动的高涨开始。

这样,读者所看到的这本书,其内容有将近30%是

新的(这是只就初次出现的文字计算,若把部分改写的文字也计算在内,那就当然比 30%还要多些)。这对于已有前两版本书的人当然不大方便。但是我早在第一版的序言里就预先声明过,每出一新版都必将改写。所以我绝不能提出诺言,说这一版的文字就是最后的 (ne varietur)。历史的辩证法不可避免地决定也要有历史编纂学的辩证法……

1927 年 11 月 10 日

米·波·

导 言^①

我们余下来所要研究的俄国史的最近时期（1897—1929年），整个都在于为一桩巨大的事件——伟大的俄国革命——进行准备和应付这一巨大事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我们根据这次革命的转折点——1917年10月25日（旧历）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简称之为“十月革命”。但是，在这以前的一切是为十月革命做准备，在这以后的一切是对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保卫。列宁始终认为这种保卫工作比夺取胜利本身更困难。他在1905年3月间写道：“如果俄国专制制度不能脱身，如果它将不仅被动摇，而且将真正被推翻，那时候一切先进阶级为了保卫这个胜利成果，显然需要有巨大的革命毅力。”^①

这种对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保卫工作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着。新的武装干涉的威胁，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所雇用的力量再次入侵我国的威胁，依然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威胁。人们时常一再地说，我国工人阶级发动革命比较容易，而它的西方同志们则结束革命将

① 原书未注明引文出处。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69页。引文与《全集》稍有不同。——译者

比较容易。经验表明，我们连结束革命大概也比我们西方同志们开始革命还要困难。同时，世界运动经过了从英国直到中国那么遥远和复杂的道路，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整个一个巨大的历史时期——这一点也是我们从前常常谈到的——到现在才在我们面前很明显地和具体地全部呈现出来。世界的十月革命还没有完结，而且完全不会很快地完结，因而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斗争也连带着没有完结。

我们在这本《概要》前两编里研究的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与此相反，在这一编里我们就要说明自己的现在了。这件工作有其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在这里不必多叙述和说明从表面上完全能看到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甚至象少先队员那样年龄的读者都清楚地知道。特别是不必多叙述十月革命本身。这种叙述对于下一代人来说是需要的，但是对于现在活着的人来说，可以大胆地设想，不止一位读者曾亲眼看到过事变的经过。简短扼要地讲一下，对读者不会有什么用处。当然，许多人还会记得 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

但是，说明所有这些事变，远不是多余的事情。这就使我们和读者的地位开始不利和困难了。说明一桩完全结束了的事件容易，因为它的开头和结尾都摆在我们面前，这时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当你在事变过程中写作的时候，那就不得不随着事变一起运动。正象翻山越岭每到峰回路转时，就展现出一幅新的景色一样，在这

里也是一些逐渐增加的新的事变细节会引起一些从前连想都没有想到的新观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革命见证人和参加者所写的革命史往往相当于回忆录，或者干脆是政论性的作品，有的问题作者往往只有死后才能结束同自己政敌的争论。不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处境要比我们的资产阶级前辈有利：我们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有方法，有能解释一切事变的钥匙，不管这些事变是发生在昨天还是发生在三千年以前。在我们中间虽然也可能发生争论，那只是运用这个方法是否正确的问题。当然，对于读者将在本书看到的那些说明也可能发生这种争论。但是我们的争论将由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要求严格地规定范围。不过读者不得不考虑的主要一点，就是对于还没有结束的事变不能做出完整的描述。我们历史道路上新的一些转变会把我们从前在十月革命中没有发觉到的新方面提出来，而把我们昨天认为是最主要的方面推到不令人瞩目的位置上去。

即使有这些转变，但有一点当然是不会变的：不管立足于何种观点，十月革命永远将是伟大的俄国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旧日为了讨好沙皇所加的那种尊称如彼得“大”帝，叶卡德琳娜“大”帝吗？不是的，这一次“伟大的”一词可以具有明确的含义了。历来的革命或是以推翻旧制度而告结束，或是以旧制度向要求新制度的人让步，即旧的豁免新的而告结束。当我们的资产阶级敌

人看到 1905 年革命即将发生并认识到这次革命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只向自己的上帝祈祷一点：希望这次革命将是上述类型中的第二种，而不是第一种。为了清楚起见，他们甚至以两个数字来表达：他们说，但愿这次将是 1848 年，而不是 1789 年。可是这两个数字却给了我们一个好机会来说明“伟大的”革命与“不伟大的”革命之间的区别所在。

当人们讲起 1848 年时，通常并不是指很象我们的 1905 年革命的法国那次没有成功的工人革命，而是指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和“非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先谈“1848 年”和“1789 年”。在 1848 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政府并没有被推翻，奥地利政府只不过逃亡了一个时期，后来很快又回去。在普鲁士连这种情况也没有。在那里，革命的结果是政府被迫制订宪法（在奥地利，很快又把宪法收回，过了二十年才恢复），也就是给予资产阶级和富有知识分子，即整个有产阶级以某种程度的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而进行这次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却只得到了最小程度的参与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利，而且多半是书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这也是 1905 年的俄国的“自由派”认为最理想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旧制度的“基础”——君主制，等级，贵族，官僚主义的官吏统治，就原封不动了。

与此相反，1789 年在法国发生了打倒旧政权的革

命。在这一年，实际上国王已经做了资产阶级国民会议向他要求的事情。后来进行的斗争大多是针对大资产阶级以及附和他们的贵族阶级和僧侣阶级残余的（大部分贵族都已逃亡国外）。在这一斗争过程中，王权在形式上已被推翻（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且很快变成民主共和国（1793年宪法），变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

这时，“旧制度”的那些上层被铲除得干干净净。等级和旧的官僚政治都随同王权一起消失。神甫们分别躲藏到地窖里面去了。在上述这一方面，法国革命比我国的革命走得远。一般地从表面看来，法国革命似乎做得比较彻底，革命中有较多激烈的表面变革，有较多戏剧性的场面。例如，我们还是按照旧方法计算年月，可是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从宣布成立共和国之日起实行了新历，对于月份和一周中的各日规定了新的名称，诸如此类。但是，我再重复说一句，这些都是表面的改变。法国革命虽然铲除了旧的肮脏制度的上层，却没有触动最牢固的下层：土地和生产工具私有制依然保留未动。大部分贵族土地和全部教会土地被没收了，但不是根据一般性法令没收的，而是根据某种个别理由没收的，例如，没收贵族的土地是作为对土地所有者逃亡国外的惩罚。这些土地并没有分给劳动者，而是卖给了革命所产生的新兴资产阶级，后者又以高价把土地转卖给了农民。劳动条件不仅没有由于革命而有所改善，甚至更坏了。例如，罢工被

禁止，可是工厂主仍旧是工厂主，并且保留了他们的全部权利，工厂并没有收归国有。

劳动者，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农民，——工人还没有作为单独的阶级出现，——把政权夺取到手以后，没有下决心彻底加以利用。领导他们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象我国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仅只谈论“土地法”，多半是为了恐吓资产阶级，而事实上则对“神圣的私有制”感到迷信式的恐惧。结果法国劳动者专政的时间极其短暂：他们在1793年6月初完全掌握了政权，可是到了翌年即1794年7月27日——按照革命新历是热月^①九日——，他们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就被大致相当于我国右翼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的那些资产阶级党派所推翻并处死。后者很快就取消了民主共和国而恢复了资产阶级政权（恢复了选举资格等等）。这样，纯革命政权在法国一共只维持了十四个月。

这样看来，法国大革命比起俄国革命来，其深度要小得多，因而进度比较迅速，存在比较短暂。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罗伯斯庇尔倒了台？由于起初很爱戴他的人民群众——他本来也和我们的伊里奇一样受人爱戴——到了最后不再支持他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革命专政的任何好处。所有的富人、商人、工厂主、承包商，甚至服从和承认了共和国的地主，都保留了自己的地位，而

① 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源于希腊文 *thermē*——热。

且只有更加富足。而革命的一切费用都由人民群众负担。无怪他们很快就失望了，不耐烦去斗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革命专政在法国连一年半也没有坚持下来，而在我国却已经存在十三年了。

这样看来，过去欧洲所发生的最大一次革命，比起俄国革命来，其深度毕竟是较差的。所以，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才能有一个准确的尺度来评价我们能有机会成为其见证人和参加者的那些事变。既然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都被称为“大”革命，那末，我国的革命对这样的称呼就更当之无愧了。

但是，同法国革命的比较，也可以顺便解答上面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非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表示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创造必要条件的革命，或者表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1905—1907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做前一种理解的主要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对它做后一种理解的则是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他根据这一点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全力支持据他说“正在实行革命”的资产阶级。

法国革命是兼有上述两种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它铲除了所有横在旧法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道路上的无数障碍。在旧日的法国，无论是国家和社会都被许多壁障分割成无数的小方块。一个省同另一个省被关税的分界线分隔开来。例如，没有当局的特别许可，就不

能把粮食从一个省运到另一个省去。每一省都有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也就是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流通需要了。在每一个村庄中，都有为地主、教会等规定的种种“特权”。这些特权也存在了好多世纪，而且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例如，农民有义务到地主的池塘去吓唬青蛙，免得它们打搅地主的清梦）。当然，由于这些特权的荒唐，已经没有人来直接享受它们，可是农民仍然被迫赎免这些义务，于是农民经济的大部分剩余产品就通过这种途径落到地主或神甫的手中，落到不事生产的阶级手中。“特权”压在劳动群众头上之重，使得 1789 年的革命就是在“打倒特权”的口号下开始的。

如果说各省的特权一般说来阻碍了贸易和投资，那末，等级的特权不但使农民破产，使他们不论怎样劳动也总是贫穷，而且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而没有国内市场，要想建立巨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是不可能的。要使资本主义能在法国发展起来，就必须取消“特权”。革命正好做到了这一点。它以一直存在到现在的郡代替了中世纪的省。郡是纯粹的行政区，其组织完全一样，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卡阻拦。地主和教会所享受的一切特权都取消了。在初期，上面所提到的“国民会议”曾想迫使农民仍要赎买——一劳永逸地——最大的一些特权，这是促使革命继续下去并建立了劳动者专政的推动力。民主共和国给予法国农民的好处，主要就是完全不用赎买而取

消了旧日的特权。在这以后，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而法国工业也终于得到了范围相当广阔和容量相当巨大的国内市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国革命确实取消了横在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记得，它唯独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即土地和生产工具私有制。我们还看到，与这种情况完全一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法国革命中完全占了统治的地位。革命所培养出来的少数社会主义者当然要作为密谋者起来反对革命政府，结果被革命政府处死了。而他们确实也发动得太晚了，已经在罗伯斯庇尔被打倒以后了。其实，罗伯斯庇尔对于社会主义者也无所爱惜，尽管他有时也抛出一些社会主义的词句，而且他把所有想要触动“神圣的私有制”的人都无情地处死了。

由此可见，法国大革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1848—1849年的“不伟大的”德国革命也是这种性质的。伟大的俄国革命也是这种性质的吗？

首先要问，在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是否也有过象革命前的旧法国所有过的那些障碍？有过，但是少得多。在20世纪初以前，我国根本没有那种可能阻碍贸易和投资的各地各州的特权。俄国商业资本那时已经广泛地为自己的小兄弟——工业资本扫清了道路。至于说等级的特权，在我国主要就是我们所知在1861年所废除的农奴制。但是，我们也知道，农奴制的废除只是以不妨